

【共和国史研究】

# 强国与富民：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初期的探索

张瑞敏

**【摘要】**如何协调处理好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初期迎头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为了梦寐以求的强国梦,在当时国内外客观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多方权衡,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民生改善暂时被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这一时期无论是“大小仁政”说、还是“九天九地”说的分歧都反映了这一定位。同时整个毛泽东时代强国与富民关系的基本格局也在这一时期奠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放弃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目标,在强国与富民的矛盾表象背后则是以强国保障民生的共和国建设初期的发展战略规划,这是内外环境下党不得不采取的策略。党全面执政初期所确立的强国、富民关系基本格局影响长远,而在历史进程中党的人民观、民生观得到不断发展,为后来改革开放调整发展战略,以“温饱—小康—共同富裕”民生发展指标作为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新坐标奠定了基础。而今,“中国梦”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与人民幸福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核心的执政理念。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强国;富民;中国梦

**【作者简介】**张瑞敏(1965—),女,河南洛阳人,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中特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成员(湖北 武汉 430074)。

**【原文出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2020.5.66-75

对于有着近百年历史、七十多年执政史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如何摆好强国、富民在国家发展中的位置显然不是一个新课题,但始终是一个历久弥新、充满时代气息与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

强国和富民从来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中不可分割的目标追求,当党的社会角色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互为正变量的二者却出现了此消彼涨的相悖情形。从1949年全面执政伊始,中国共产党便不得不直面协调强国与富民二者关系这一非常考验执政能力的考题。围绕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所交出的历史“答卷”的评价,学界的纷争一直没有平息。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强国为主旨的“代表作”——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评价问题。总体而言,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经济政策界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评价大体经历了从肯定到几乎彻底否定的过程。以林毅夫为主要代

表的一些学者,从质疑“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发展”的理论是否是一个客观规律出发,坚持认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造成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与消费不平等的直接肇事者<sup>①</sup>。2000年以后,随着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一些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再度反思,“二分法”自此成为主流声音。多数学者指出:“一五”时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失为适合当时国情的一个正确选择<sup>②</sup>;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方针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持续的时间过长了<sup>③</sup>;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出台有其合理性,由此而带来的建设成就与奠基作用不容否定<sup>④</sup>;后人不能用以后的历史来否定当时的历史<sup>⑤</sup>。学者们同时也指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带来的主要弊端是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等<sup>⑥</sup>,并认为这一战略抉择虽然存在一定历史局限性但总体看,使中国抓住了

当时的历史机遇大大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sup>⑦</sup>。近年来,还有学者从国家治理体系的视角分析优先发展重工业确立的原则与存在的体制缺陷、制度风险等,采用的也是二分法<sup>⑧</sup>。这些研究起到了更加客观看待当年道路选择的作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的着眼点主要在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虽然指出了这一战略选择对人民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大多都是一笔带过或浅尝辄止,没有予以深度阐释。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学界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富民思想,而大张旗鼓地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观进行探讨并形成热潮则是在2007年以后,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再度使用“民生”这一观念,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在消失沉寂多年以后,“民生”这一重要观念再度回到公众的视野和学者研究的视域<sup>⑨</sup>,自此“民生”话题成为点亮时代的一个重要符号。本文尝试站在近代中国赋予党的历史使命的视域,考察党全面执政初期对强国、富民的定义与权衡,深入分析党的民生观的发展以及“强国与富民”如何从最初的共生相悖发展到今日的相得益彰,从而理解“以人民为中心”何以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坚定的信念。

### 一、“小仁政”要服从“大仁政”的现实考量

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后,特别是19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以后,迎面遇到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1956年毛泽东将其归纳为“十大关系”<sup>⑩</sup>。周恩来则指出,“十大关系主要的是经济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关系摆得是否恰当”<sup>⑪</sup>。20世纪5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曲折的探索,其中的得失与成败见证了党执政能力的不断提升、成熟,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经验。

194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指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sup>⑫</sup>。1949年9月,新政协所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

工业国<sup>⑬</sup>。可以说,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矢志以求的奋斗目标,也是近代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历史境遇激发出的无数先驱的奋斗梦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对“一穷二白”、破败不堪的国民经济现状,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首先进行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的工作。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即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失业的分子和工人、一批小手工业者以及农民都对党有所不满<sup>⑭</sup>。因此,争取国民经济的基本好转以应对当时的经济困局,缓解社会中的不满情绪,巩固新政权,成为当时党的中心任务。新民主主义政纲的实施也是在这一国情背景下展开的。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较好的恢复<sup>⑮</sup>。

在此基础上,党的领导人开始把实现工业化目标提到日程上来。1953年,以“一五计划”为标志,中国正式启动了工业化建设。“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sup>⑯</sup>,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这一认识是苏联工业化的重要经验,也成为当时中共中央上层的共识。按照当时中共中央的说法,就是“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sup>⑰</sup>,言简意赅地道出了核心认识所在。

也就是从这时期开始,毛泽东的关注点发生了明显的转移,他开始更多地考虑工业化的进程问题。这从两件事情上可以反映出来。一是关于1953年的国家预算,毛泽东提出要重点开支,以顾全大局,可缓办者缓办——“一定要重点建设,平均摊派是不行的”。他说:“只要把大的搞起来,天下样子就变了。”<sup>⑱</sup>二是1953年7月,中共中央发文宣布:由于国内农村灾情相当严重,须予以必要的救济,抗美援朝战争使得国防费用难以减少,“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必须积累必要资金投入工业建设。因此,中央决定在国营企业中,不进行全面调整工资,标准工资一般不动,并取消年终双薪(或年终奖金)制度和暂缓普遍实行年休假制度”。为了让党内

党外群众接受这一点,毛泽东要求中央有关领导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sup>⑩</sup>。

从“一五计划”开始,重工业被确定为国家建设的重点。周恩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sup>⑪</sup>然而,由于重工业生产的特点(投入大、盈利慢、周期长)多数产品不是直接供给消费的日用品),就直接或间接地带来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生产与生活的不协调、供应与需求的失衡,引发国家长期建设与人民生活改善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如抗美援朝军费等一些必不可少的支出,民生改善受到很大影响。在此背景下,社会上出现了呼吁政府“施仁政”的声音。针对这种观点,195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解释说,因为打仗要用钱,建设方面要用钱,农民的生活也还有困难,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随后他话锋一转,阐述了他的两种“仁政观”,他说,“说到‘施仁政’,我们要施仁政的”,“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sup>⑫</sup>。

毛泽东所谓的“大仁政”、“小仁政”其实是指共产党人革命逻辑中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关系问题。“大仁政”指的就是“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小仁政”指的就是“眼前利益”或“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固然重要,但为了实现革命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往往必须牺牲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特别是个人利益,对于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是党内的一种普遍的共识<sup>⑬</sup>。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党的高层领导认为如果不独立地将工业、经济和国防搞上去,其他都是妄谈。所以,人民生活的改善不可不照顾,又不可多照顾。总之,小仁政不能妨碍了大仁政<sup>⑭</sup>。

毛泽东还进一步阐释重点发展重工业的理由,他说:“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私

营为主。……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sup>⑮</sup>他认为:“最要紧的是多炼钢铁,多产煤炭、煤油和电力,多造机器。只有工业发达了,国家才能多造新农具和农业机器来帮助农民发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才能多修铁路公路把城市和农村联接起来,才能多修水利来发展农业,才能用大量的便宜的化肥、杀虫药剂、药品、糖、布匹、自行车、收音机、电影等各种日用东西来供给农民。”<sup>⑯</sup>

主管政府工作的周恩来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周恩来还特别对比了我国与苏联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时面临的内外条件,指出我国首先“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sup>⑰</sup>,这是当前国家的中心工作,为了将来过上幸福生活,“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但是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暂时的困难和不便,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还是因为贪图眼前的小利,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好呢?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第一个主意好,第二个主意不好”<sup>⑱</sup>。

作为分管财经工作的陈云,直接参与了国家“一五计划”的制定,他也多次向党内外解释重点发展重工业的理由。他说:“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短期内要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任务是很艰巨的。因此,在工业方面势必要多花些钱。农业也需要发展,因为轻工业的原料是由农业提供的,但是不可能齐头并进。如果不发展重工业,也就不可能更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社会购买力的提高,人民对吃的、穿的需要都增加了,但是农产品的增长速度比较缓慢,所以在国家大规模建设中又要照顾人民的生活需要。要照顾两方面的平衡,因而在商品供应上就会出现紧张。我们要使这个紧张的平衡不至于破裂。”<sup>⑲</sup>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题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陈云说:“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也只能是重工业”,我国的农业是落后的,铁路和其他交通设备也不足,都需要发展和扩建。但是,能够使用于五年计划建设的财力有限,“如果平均使用,百废俱兴,结果必然一事无成”。而且,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大量供应化肥、农业机械、柴油、水

利工程设备,就不可能大量修建铁路,供应铁路车辆、汽车、飞机、轮船、燃料和各种运输设备。另外,要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必须扩大轻工业。但现实的情况是,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因就是既缺少来自农业的原料,也缺少来自重工业的原料。再者,我们还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这一切都决定了我们不能不优先发展重工业<sup>⑧</sup>。

1953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发布的《关于当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也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这个观点。宣传提纲引用了苏联领袖斯大林的三段话:“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农村经济在内)的主脑,工业是一个钥匙,在这个钥匙的帮助之下,才能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来改造落后的分散的农业”;“为了工业而自己节约的道路,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这条道路,列宁同志曾多次指出过,乃是我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苏联人民在为工业化而奋斗时期“甘愿担任牺牲,在各方面实行极端节省,节省饮食,节省教育经费,节省布匹,以求积累创立工业所必要的资金”。提纲以苏联经验来论证,要求迅速大大改善人民生活是盲目冒进的思想,“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不能不有相当的限度;它必须服从生产的发展,它的速度必须较低于生产发展的速度”,宣传提纲号召学习苏联人民的这种精神<sup>⑨</sup>。

很显然,当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发生矛盾之时,号召人民群众顾全大局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一些必要的牺牲,这是当时中央领导人所持的基本立场。

其实关于大小“仁政”之说,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陕北边区就已经出现过。毛泽东也是较早使用这一提法的人。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我们党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关于如何处理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军队供给与农民负担的关系等问题。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供给战争需要我们集中一切可能的经济力量,同时要尽最大努力改良民众的生活。为了革命战争,我们只有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才能挽救人民于水火。“领导农民的土

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毛泽东在报告中批评了那种“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对于群众生活漠视不理的做法<sup>⑩</sup>。

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上,毛泽东阐述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经济和财政方面的立场。在谈到群众负担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是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老百姓供给我们军队这样多的粮食,为我们运公盐,买公债,都是很大的负担。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谅解我们,知道这种必要性。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sup>⑪</sup>。在此毛泽东阐述了他的“仁政观”,他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大仁政”,是革命政府首先要争取实现的。他批评党内一些同志缺乏战争大局观,只一味强调施“仁政”的思想。他说:“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sup>⑫</sup>他提出的口号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sup>⑬</sup>。他说,虽然处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人民负担虽重而民不伤。只要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他强调,“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sup>⑭</sup>。毛泽东的讲话强调了政府征

公粮是保证战争的需要,是符合人民长远利益的,是大仁政的体现。同时也表示,不顾及民众的生活,只考虑政府和军队的需要,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绝不能承袭。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面临国家利益与人民生活矛盾的两难抉择时,中国共产党都选择了国家利益及长远发展为重。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风貌,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全局观与大局观,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始终相信“小仁政”最终将得益于“大仁政”的实施。若从大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大小“仁政”之争,其实正是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直接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极易遇见的难题。由于以工业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此前没有在中国得到充分的发展,导致了“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局面<sup>⑤</sup>,又鉴于共和国初期国内外的现实考量及对工业化的急迫需要,我们最终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苏联式发展道路。只是这种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推进重工业快速发展的道路利弊兼具,我们在选择了这条道路优势的同时也不得不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

## 二、“九天九地”说与工人农民地位的分歧

1953年9月,中央连续召开两次高层会议,讨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11日下午的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毛泽东与民主人士梁漱溟关于工人农民地位争论的一场公案,这场公案影响颇大,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党对强国、富民关系的权衡。

政协委员梁漱溟在发言中就他在北京的见闻,提出了“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他指出:“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有九天,农

民的生活有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引起重视。”<sup>⑥</sup>梁漱溟的发言引来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究其原因既有复杂的历史纠葛,又有当时的现实因素在起作用。梁毛之争的关键所在是农业发展和国家工业化的矛盾问题。在梁漱溟看来,工农生活的差距是“九天九地”,国家工业化不应一味牺牲农民的利益。毛泽东则反击说,一味顾及农民利益是“小仁政”,国家工业化才是“大仁政”,“小仁政”服务于“大仁政”有着现实的必然性。毛泽东口诛梁漱溟是以笔杀人的伪君子,梁漱溟指责毛泽东缺乏自我批评的雅量。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历史公案的发生,表面看来貌似唐突,实则涉及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及党对共和国初期民生问题的考量。

应该说,梁漱溟的发言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此前,1949年12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农民的负担还是非常重的,在老解放区更是长期负担,自抗日战争以来的十二年几乎没有什么喘息的机会。从抗日战争以来的经验看,农民的负担是东北高、西北低、华北适中,农村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约400斤粮食,交给公家80斤,按军队每人每年开支合4千斤粮食计算,每一百个农民可以负担两个公家人。预计将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民大概还要拿出收入的20%左右来负担。农村负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1.4%,城市负担占38.9%,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货物税、盐税、屠宰税等,很多还是要农民负担的。在1950年整个预算中,军事费占38.8%,陆军开支总计210亿斤粮食,海军、空军的费用还不计在内;行政费占21.4%,经济建设和文教费用约占30%。余下的应用于临时遇到的如救灾等事项<sup>⑦</sup>。周恩来讲这番话的时候,朝鲜战争还没有爆发,其军费开支还不可能考虑到这一块。梁漱溟发言中说当时农民的负担重是符合实情的<sup>⑧</sup>。

然而,梁漱溟的发言却遭到了毛泽东激烈的反驳。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梁漱溟所言只是部分表

象,工人农民的生活虽有一点差别,但是农民的生活比起土改前已经有了改善。而且,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也绝对不是靠和工人拉平收入来解决。毛泽东质问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的,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有份。”<sup>⑩</sup>

与梁漱溟发生这样一场严重争执,首先是触动了毛泽东最基本的感情。从中国共产党的成员来看,包括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等人,基本都是出身农家,长期活动在农村,革命的胜利也是靠动员成千上万的农民参加革命,流血牺牲换来的。从历史渊源及感情方面来说,中共与农民的关系最为亲近,最有资格代表农民说话。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农民长期是中国革命队伍的基本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就告诫,必须兼顾城乡、兼顾工农,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即使是在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以后,党也始终强调工农联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农民农村是党生存的根基。梁漱溟在政协高层会议上的言论,似乎成为了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这是毛泽东难以接受的。从感情上来说,毛泽东的农民立场是不容置疑的,只不过执掌政权以后面对的现实困境不容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毛泽东批驳梁漱溟的言论,更是为新中国进行工业原始积累的选择进行辩白。从毛泽东本人的说辞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他的一句质问——“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已经清楚明白地说明了问题的核心所在。毛泽东在发言中特别提到了“中国的工业”这一关键点。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一五计划”建设也才展开,中央已经制定了过渡时

期的总路线,工业和农业哪一个优先发展的问題已经确定。在此关键时刻,梁漱溟所说的“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虽然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从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来看,工业与农业孰前孰后、孰轻孰重已经不言自明了。鉴于这种安排,工人与农民在经济生活的角色定位也就自然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

实际上,出于同一考虑和现实的羁绊,自1953年10月始,国家又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平衡城市与国家工业化建设急剧增长的粮食需求与粮食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一政策的提出者陈云直言,在粮食问题上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最难处理,“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搞不好农村会出乱子,但在当时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sup>⑪</sup>。为了使粮食统购政策顺利进行,改变农民一家一户个体生产方式,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也就顺理成章了。为此,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统购粮食通知的相关宣传稿中,特意加上了这样的一段话:“农村里一切明白道理的人都应当积极加入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加入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将来就可以再进一步实行集体农民公有制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就是集体农场)和供销合作社,实现集体生产和富裕生活。”<sup>⑫</sup>显然,此时的毛泽东不是不明了农民生活的艰难,他所希冀的是,通过合作化的途经,通过农村的快速发展来改变城乡差距而不是拉平工农差距。

然而,到了1954年,毛泽东对农村情形的看法发生了一些改变,认为农村情形并没有说的那么严重。他在12月份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时说:“我接到了很多来信。这次由广州回来,经过五个省都找各省的负责同志开了会,调查了农村情形。有人说农民每天只有六两米,这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实际上,说农民苦的是富农,他们拿这些话来反对统购统销。农村中有百分之七十的农民,他们过去是贫苦的,是拥护统购统销的。我亲自问过一些农民,他们说每天有米十四两六,加上杂粮每天有一斤粮,不是六两。今年全国粮食产量三千四百亿斤,国家共征购七百七十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其中

主要是购的占五百亿斤,征的只二百多亿斤。购的部分国家出公道价,相当于卖给私商的价钱。有的县长、科长、乡长,自己有余粮不肯卖,山西甚至有存几万斤粮的富县长。”<sup>⑧</sup>毛泽东以此为例来印证自己的观点。

后来,毛泽东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虽然也阐述了按农、轻、重安排国民经济次序的思想(这一战略思想在实际中没有真正得到过落实),但是他仍然认为我们国家工农城乡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他说:“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sup>⑨</sup>1957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不能光看收入。工人收入一般是比农民多,但他们生产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必须的支出也比农民多。”<sup>⑩</sup>2月,毛泽东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认为,近年来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恰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sup>⑪</sup>。显然,此时的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的作用过于乐观。事实上,快速转轨到集体化并没有如期待的那样一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落后制约工业发展的状况。同时,自确立了国家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以后,工农业实际存在的价格剪刀差和高积累率,使得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一直低于城镇职工。

如前所述,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确立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战略目标。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实际是“家徒四壁”,近乎空白的重工业要想取得较快发展,只能以“白手起家”、“工占农利”的方式来完成中国工业化的早期资本积累。当新政权面临工业化这一根本追求的时候,即使涉及到人民大众(农民更为直接明显)生活的切身利益,也不能不为之让路。笔者这里所论及的“九天九地”说,明面上涉及的是工人、农民在新生共和国中经济地位高低上下的意见纷争,其实它只是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内在矛盾的外化表征,与前面所论及的“大小仁政”之争具有同样的实

质。只因发展重工业是与壮大国力相挂钩,农业生产需要服务于大局,于是附着在先进的工业及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便自然地略优于附着在农村土地上的农民,倒不是毛泽东等执政者有意而为之。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选择其实也符合中国传统义利观的道德选项,反映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就蕴积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心中的悲情。

### 三、“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努力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的进程来看,国家工业化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先起工业化国家,它们从纺织业等轻工业积累起步,再逐步发展重工业,这种发展往往伴随着对内的压迫与对外的殖民掠夺;第二种是以德、日为代表的后起工业化国家,利用世界科技革命的成果,采取政府重点投资重工业,民间资本投资轻工业,政府与资本合力发展的路径;第三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道路,在经济基础薄弱、缺乏外部援助、被帝国主义封锁包围的背景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短期内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成为后发先进的工业化强国<sup>⑫</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缺乏走前两种道路的条件和基础。渴望快速摆脱近代以来工业落后受辱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别无选择地采纳了苏联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就当时的历史情境看,并不存在更好的选择。

从“一五”时期开始,中国国家建设的重点放在了重工业方面,虽然这种选择带有无奈,但是,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一直是希望同时兼顾到人民生活。

周恩来在谈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说:“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sup>⑬</sup>陈云也说:“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sup>⑭</sup>中央领导人在这一时期多次表达这样的观点。1953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央人民政府报告中的一段文字——“目前的重点是只能放在国家工业建设,只有走这条路,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会更快些”后,特别加写了一句“但是所谓工业为重点,并不是说对目前的民生不加照顾,相反,是应当照顾的”<sup>⑮</sup>。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也强调说:我们现在着力进行大规模的

工业化建设，“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创造劳动人民将来更好的生活，在将来能够更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sup>⑤</sup>。周恩来强调“要重工业，又要人民”是毛泽东多次说过的话，重点说明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改善是一致的。他说：“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sup>⑥</sup>周恩来还特别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农轻重严重不平衡为例证进行解释。1956年周恩来和陈云力主“反冒进”，反对追加基本建设预算，就是从这一认识出发的。

共和国建立初期，分管财经工作的陈云提出“一能吃饭、二能建设”的主张，把吃饭摆在了建设的前面，他力主二者的平衡“为了照顾民生和建设，应该是在照顾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民生条件下来搞建设”，“在物资的分配上，首先应该照顾到必需的民生的生产，保证必需的民生（当然不是大吃大喝），有余再搞建设。这就是既要建设又要人民，这样的建设才是可靠的”<sup>⑦</sup>，并认为这是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他指出，人民群众固然关心重工业，但更关心农业、轻工业和商业工作，这些与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人是要吃饭的，只注意建工厂，不管职工的吃喝问题是不行的，将直接影响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决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sup>⑧</sup>。

毛泽东曾经熟读苏联重要历史经验总结的经典读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对俄国战时共产主义期间推行的“余粮收集制”<sup>⑨</sup>政策导致农民与新政权之间的激烈冲突印象深刻。因此，他对列宁在世时所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也有良好的印象。他对苏联后来的农业政策多有批评，认为“对农民挖得太苦”，不赞成对农民采取“竭泽而渔”的方法。毛泽东看到了农村中95%的农民“更多注意个人利益”的现实，所以，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要适当调整。必须处理好国家同农

民的关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要争取绝大多数合作社（占90%）、绝大多数的（占90%）社员收入逐年有所增加<sup>⑩</sup>。他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基建投资多了，非生产性建设也多了，影响了农民的增收<sup>⑪</sup>。他强调：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忽视了这一点，就可能犯大的错误。应该把积累、个人收入、发展副业等都纳入规划之中<sup>⑫</sup>。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一直是高度重视经济建设与民生改善的关系，无论是毛泽东提出的“农轻重”排序，周恩来强调的“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还是陈云所说的“一能吃饭、二能建设”，都是希望能兼顾好两方面，搞好平衡。作为最主要的决策者，毛泽东从来没有把二者放在对立面，他也总是提醒要辩证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二者兼顾，搞好平衡。从主观上而言，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中国要避免走苏联的发展模式。然而，执政的困境却没有给毛泽东更多的选择。一穷二白的家底，各种开支的挤压<sup>⑬</sup>，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未久也不得不直接面对亿万农民实施征粮。由于在统购统销政策实施的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加上1954年又征购了“过头粮”，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一时变得紧张起来。针对这种情况，1955年中央制订了定产、定购、定销的粮食“三定”政策，来完善统购统销政策，使农村紧张关系与社会矛盾有所化解。但是，国民经济紧运行的总体形势却一直没有得到根本好转。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特别谈到处理二者关系的原则：“必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也就是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正确的处理”。积累的比例既要保证工业化建设需要，也不能伤及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全国人民必须使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sup>⑭</sup>。周恩来在八大总结“一五计划”时指出：“经验证明，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的，它必须有各个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农业的配合。”<sup>⑮</sup>八大的政治报告还明确提出“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sup>⑯</sup>。党的八大对经济建设与民生关系所形成的认识是非常有见地的，遗憾的是，这一认

识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sup>⑥</sup>。

#### 四、余论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多灾多难的年代。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屈辱和动荡的历史使其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地肩负起强国与富民的双重使命。28年的浴血奋战换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政权的建立为向“国强民富”目标挺进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工业化是国家强盛的标志,也是共和国的领导者追求的首要目标。只是始料未及的是,伴随着工业化的起步,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即强国与富民之间出现了一时难以两全的突出矛盾。对这个矛盾党是有清醒认识的,在八大前后就已经形成了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要把二者对立和割裂开来的观点。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令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更倾向于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去考虑布局。由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被认为是实现全国人民更高更长远利益的体现,为了这一更具政治意义目标的达成,便不能不对政府的民生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即人民生活的改善需要让位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于是便出现了为了国家的工业化而动员人民节衣缩食、牺牲眼前物质利益的历史场景。当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强调国家利益至上时从来不是不要“小仁政”,而是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兼顾、关照后者。毕竟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看来,这种选择只是情非得已的权宜之计,当下的“强国”正是为了将来更好地达到“富民”的目标。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主导下,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初步建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遗憾的是,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紧运行状态长期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加上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多变(譬如本以“吃穿用”为主体内容的“三五”规划最后被以备战为核心的“三线建设”所替代),中央一直没有找到调整发展战略的有效时机,一时的权宜之计被长期沿用下来,以强国为标识的重工业发展带动民生发展的夙愿未能实现。

从197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抓住有利时机进行工作重心的转移,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并把“温饱—小康—共同富裕”确立为衡量国家现代化发展征途上的坐标位。这种转变对于中国及其执政党而言

意义极为深远。民生中国的到来既是对毛泽东时代未竟事业的历史补偿,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经过多年的执政实践后自觉调整发展战略带来的最重要变化。党的十八大以后,将国家、民族、个人作为命运共同体,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梦”的提出与当下实践,无疑是把强国与富民更紧密更明确地结合为一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就必须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sup>⑦</sup>今天的中国迎来了“强国”与“富民”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新时代。

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对强国与富民策略的探索,绝非时过境迁。回首走过的峥嵘岁月,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避免类似苏联那种重工业畸形发展导致积重难返的悲剧性后果,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来得流畅许多,无疑是“因”共和国初期所奠定并一直坚守的“要重工业,又要人民”执念所得来的“果”,在此奠基之下,“以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今日执政理念的总基调,“上升为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sup>⑧</sup>。

#### 注释:

①林毅夫、蔡昉、李周:《对赶超战略的反思》,《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

②参见叶扬兵:《论“一五”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5期;董志凯:《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新中国的必然选择》,《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10期。

③姚洋、郑东雅:《重工业与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时代再考察》,《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

④武力:《一以贯之坚持走自己的路》,《经济日报》2019年5月20日,第12版。

⑤豆庆升:《“一五”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生观考察—基于对“一五”计划的文本分析》,《晋中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⑥蔡昉:《中国发展蕴含的工业化规律》,《企业观察家》2019年第9期。

⑦朱佳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朱佳木:《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及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⑧蔡益群:《改革之前二十年中国国家治理体系》,《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3期。

⑨20世纪60年代以后,“民生”一词在中国媒体上淡出,很长一段时间学界论及的“民生”也几乎专指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2007年以后,有学者开始讨论“民生”的内涵及特征(参见吴忠民:《民生的基本涵义及特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第5期)也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呼吁关切“民生参见吴苑华:《关切“民生”:一个不能忽视的马克思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

⑩“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参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49页。

⑪高长武:《1956年周恩来、朱德对〈论十大关系〉的阐释和发挥》,《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

⑫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7页。

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59页。

⑭毛泽东在这部分讲话中对他在这次会议上的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作了说明,解释了报告的战略策略思想。他说:“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参见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3-76页。

⑮参见庞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总序”,第2页;周恩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0页。

⑯周恩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9页。

⑰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简机构、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

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75页。

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4-25页。

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28页。

⑳周恩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9页。

㉑毛泽东:《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05页。

㉒杨奎松:《从“小仁政”到“大仁政”——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人在农民粮食问题上的态度异同与变化》,《开放时代》2013年第6期。

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63-164页;另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64页。

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32页。

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87-188页。

㉖周恩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9页。

㉗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86页。

㉘陈云:《在省市商业、采购厅局长和供销合作社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㉙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92-593页。

㉚《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04、712-713页。

㉛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141页。

㉜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3、894页。

㉝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4页。

㉞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

选集》第3卷,第894—895页。

⑤毛泽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7页。

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3页。

⑦汪东林编:《梁漱溟问答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2页。

⑧周恩来:《当前财经形式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周恩来选集(下卷)》,第5—7页。

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民公粮征购的负担情况,还可参见杨松松:《从“小仁政”到“大仁政”——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人在农民粮食问题上的态度异同与变化》。

⑩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67页。

⑪庞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第320页。

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一……?。》第2卷,第187页。

⑬毛泽东:《关于政协的性质与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6页。

⑭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页。

⑮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6页。

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1—222页。

⑰参见杨凤城:《新中国新时期与新时代》,《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5期。

⑱周恩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9页。

⑲陈云:《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0页。

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58页。

㉑刘少奇:《国家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0页。

㉒周恩来:《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0页。

㉓陈云:《正确处理民生和建设的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3卷,第134—135页。

㉔陈云:《一定要把蔬菜供应问题解决好》,《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8页。

㉕即政府对粮食全面垄断,禁止私人买卖,用行政措施把农民手中的余粮全部集中起来,由国家储备并有计划地供应给军队和城市工人。

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68页。

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61页。

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62页。

㉙刘少奇在总结中提到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国家的军政开支是很大的,在第一个五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估计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32%。参见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77页。

㉚《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346页。

㉛周恩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6页。

㉜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86页。

㉝“我们过去在某些具体工作中没有真正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基础的位置上,采取的有些政策和措施不利于农林牧副渔业的全面发展和农民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不够和没有充分生效,农业技术改造没有当作一项中心任务真正抓紧,农业科研和教育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也执行得很不好。这些也都妨碍了农业的迅速发展。”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9—180页。

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㉟张太原:《中共党史视野下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